

共和国成长教育丛书

大国方略

新中国外交五十年

● 主编 邓先明 胡海 ● 袁海英 刘海燕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目 录

一、揭开共和国对外关系新的一页	(1)
外交三原则	(1)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5)
先谈判，后建交	(7)
二、“一边倒”，中苏同盟	(11)
两位伟人首次握手	(11)
谣言四起：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	(13)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5)
三、中美对抗	(20)
对美国的最后警告	(20)
断然决策：出兵朝鲜	(22)
美国为什么没有乱摔原子弹	(25)
“像一群猎狗一样到处寻找线索”	(27)
四、初登大国讲坛——日内瓦会议	(30)
“只当顾问，不当指挥员”	(30)
日内瓦会议的召开	(32)
中国推动和平进程	(34)
五、遏制与反遏制	(38)
新月形包围圈	(38)
万隆会议	(41)
在越南的较量	(43)

西方不是铁板一块	(46)
六、与苏联决裂	(48)
新的阴影	(48)
“宁可被辗得粉碎也不屈服”	(50)
国防部长野外挨冻	(53)
七、中印争端	(56)
尼赫鲁：中国是我最崇拜的国家	(56)
边界冲突	(59)
新阶段中印关系	(62)
八、跨越大洋的握手	(65)
三角对抗	(65)
美国心力交瘁	(67)
中苏会晤，尼克松焦急万分	(69)
乒乓外交	(71)
中美关系正常化	(73)
九、重返联合国	(76)
“重要问题”	(76)
“踢山姆大叔一脚”	(79)
全面恢复在联合国的活动	(82)
十、一衣带水的邻邦	(85)
以民促官	(85)
中日建交	(87)
怎样面对历史	(92)
十一、中苏关系正常化	(96)
三大障碍	(96)
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	(99)
从中苏到中俄	(102)

一、揭开共和国对外关系新的一页

这是一个震撼世界的历史时刻。它发生在本世纪中叶古老的东方。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正，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数十万人群，激动地仰望着天安门城楼，凝视着中央话筒前的那位健壮伟岸的中国人——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声音传遍全中国，传遍全世界。

沸腾的广场上，鲜花、彩旗、白鸽和欢呼的人群交汇成一个激动人心的壮观场面。

毛泽东用他那指挥百万雄兵的大手，轻轻按动了一枚小小的电钮。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54门大炮齐鸣28响，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先烈们前赴后继奋斗流血的28个年头。古老华夏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再生了。年轻的共和国以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新中国的对外关系也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外交三原则

1949年春、夏之间，毛泽东主席先后提出了“另起炉

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方针。这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作出的重大决策，它为开国后的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

共和国成立前后，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但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存在，中国大陆一些边远地区、岛屿还待解放。美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支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特权、势力和影响在大陆还严重存在。要想建立并巩固人民政府，就必须彻底割断同国民党的残余力量的公开的、潜在的、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以至思想文化方面的联系。

1949年1月底，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到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在这个华北平原不起眼的小村庄里，毛泽东就国内国际形势与他进行了多次会谈。在谈到中国对外政策总方针时，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毛泽东主张，必须彻底清除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不能给他们留下活动的余地，即在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先有步骤地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中华民族悠悠文明五千年。然而，当历史的脚步踏入19世纪中叶，带给我们的却是百年忧患、百年国耻。历届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的欺侮压迫下，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我们的民族已是满目疮痍。新中国要摆

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坚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创造自己的繁荣与尊严，就必须坚决反对旧的屈辱外交，就必须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1949年春天，毛泽东在谈到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所要奉行的对外方针时说：“我们的一个重要方针是‘另起炉灶’。”这条方针的涵义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对于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重新审查处理。

1949年11月，新中国的外交部成立。关于外交部的人员构成，周恩来总理强调：我们决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办外交，必须“另起炉灶”。周总理还提出了16字方针，即“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以此为指导来选拔和培养外交干部，创建了一支新型的外交队伍，为共和国外交掀开新的一页提供了保证。

“一边倒”是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6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的方针。他写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40年和28年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这就明确宣布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立场。

和对外基本方针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一边倒”的决策是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中共的唯一选择。

回顾一下二战以来美国与中共的关系。二战后期，中共曾奉行寻求同美国合作的政策，但美国政府实行的却是扶蒋反共的政策，关上了美国与中共发展关系的大门，没有给中共留下选择的余地。尽管中共一再表明希望美国在对待国共关系上持慎重态度，也表明了希望战后与美国发展关系的愿望。但是美国出于控制中国和狭隘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明知违背中国人民的愿望，仍一意孤行，坚持扶蒋反共。其结果是导致中共对美国的极不信任，中国人民的反美仇美情绪更加强烈。年初，国共决战的三大战役全面结束，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此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却仍不识时务。他在接见国会议员时提出了“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即只要国民党政权不垮台，就不改变支持该政权的政策。这等于又一次关死了可能通向中共的大门。与此同时美国鉴于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采取加紧扶植日本以取代国民党在中国在亚洲的地位的战略部署，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视为苏联的附庸，在政治上加以反对，在经济上加以封锁。这不能不使中共感到安全受到威胁，也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造成极大困难。这就更加促使中共积极寻求同苏联结盟。这样不仅可以威慑美国，使其不敢对新中国轻举妄动，确保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安全，而且还能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获得必要的经济技术援助。

再就苏联与中共的关系而论。苏联在本世纪40年代末对中共态度的变化，促使中共更加坚决地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中共三大战役取得胜利之际，苏联没有像美

国那样“等待尘埃落地”，而是立即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同中共领导人商谈新中国政权成立的问题，并商定待新中国一成立，苏联立即予以承认。此外，苏联不仅在亚洲是抵抗美日的中坚力量，可以成为中国可靠的战略后方，而且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它可以为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模式。

总之，外交三原则的提出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决定的，而是当时国内国际政治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其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捍卫新中国的独立自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当三大战役结束的时候，美国在上海、青岛还驻有军队，美国和英国的军舰还在长江下游航行。有些帝国主义国家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还设有兵营。当沈阳、北平、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地解放时，美国官员仍没有走，这批前驻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员多达 800 余人，他们仍企图以国民政府承认的外交官员身份继续活动。一些外国的国民、法人、团体均在中国境内继续经营企业，享受“国民待遇”。西方国家的船舶仍在中国内河自由行驶。中国海关总务司到全国解放时仍为英国人所把持。帝国主义国家生产的商品或在华制造的商品，出入中国国境或就地销售，享有同中国商品一样的待遇。涉及中外双方国民、法人和团体争执的问题，中国法院仍完全信任双方为之设立的公断机构的裁决，等等。帝国主义这些特权在华的继续存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分别先后缓急，对帝国主义的特权和势力加以肃清和处理。

对于原国民党政府时期各国在华的外交机构和没有离华的外交官，中央人民政府一律不承认其地位。在新中国同他们的国家建交前，这些外交机构所进行的活动一律视为不合法。例如，前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柏曾以“总领事”身份给中国外交部写信，信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对于这些还没有离开中国的各国前外交官，人民政府均作为普通外国侨民对待，对其正当权利加以保护，对违法者则依法论处。美国前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由于从事间谍活动，被中国专政机构逮捕。美国即以它的“外交官”被捕为由向中国抗议，同时向30个国家发出照会，妄图煽起反华浪潮，给新中国施加压力。但人民政府坚决依据中国的司法权予以处理。尽管后来美国在撤侨问题上一再制造事端，但由于中国政府毫不动摇地坚持既定方针，美国终于在1950年4月30日从中国撤走了这些侨民。

1950年1月6日北京军管会宣告收回外国兵营地产权，征用其兵营和其他建筑。第二天，军管会向美、法、荷前领事发出命令，令其按期交回兵营。这些前领事起初企图以过去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进行拖延抗拒，但慑于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最终不得不将这些本属中国人民的财产交还中国政府。同年4月北京军管会征用英国兵营，6月天津军管会征用了美、英在天津的兵营，9月上海军管会收回法国在上海的兵营。

1949年10月25日，中国海关总署成立。1950年1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关税政策的海关工作的决定。4月18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5月16日又公布了新的海关税则，对新中国海关的基本任务、外贸监督和管制、关税政策和进出口税则等都作出了系统而明确的规定。从此，中国海关真正掌握在了中国人民手里。

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统一航运管理的指示。规定外轮一般不许驶入中国内河，只有在特定条件下经中国政府批准，才能驶入长江，但它们必须悬挂中国国旗，遵守中国一切法令并封闭其武器和电讯、摄影、测绘等设备。

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特权，也是经过坚决斗争的。面对帝国主义的阻挠，1950年1月18日新华社评论严正指出：中国人民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保卫自己祖国的主权的立场，是从不考虑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意志的；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制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特权，必须废除；帝国主义者撤退也好，不撤退也好，叫嚣也好，威胁也好，对中国人民的这个正义立场丝毫没有影响。这个评论鲜明地表达了新中国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的坚强决心。

先谈判，后建交

新中国外交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走向国际社会。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

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周恩来外长将此公告正式函告世界各国政府。当时来自世界各国的反应是复杂多样的。社会主义欢呼新中国的诞生，都很快表示承认新中国，愿意建交。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也表示承认新中国，愿意建交，但其中有些国家对国民党集团的态度一时还不明朗。有些国家如英国，主要出于尽可能保留其在华利益的考虑，也比较快地承认新中国、愿意建交，但又不愿意完全断绝同国民党集团的关系，甚至在某些场合站到国民党集团一边。美国则公开继续支持国民党集团，对新中国采取不承认政策。根据这些不同的情况，中国在建交问题上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它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就致电表示承认新中国，愿意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日声明断绝与国民党集团的外交关系。鉴于此，周恩来外长致电苏联，表示“热忱欢迎立即建交并互派大使”。继苏联之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也相继承认新中国并互派大使。中国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交，并在此基础上同它们开展友好合作关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巩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其饱经战争创伤的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鉴于当时有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仍支持国民党集团，同国民党政府保持所谓的“外交”关系，中国政府没有采用一般国际惯例，即只要两国政府互相发出承认的电文，就是彼此外交关系的开始的做法，而是坚持“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也就是坚持在建交前双方派出代表就建交

“程度”等问题进行谈判。只有当对方明确表示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将该国境内属于中国的财产交还给中国政府时，方可就建交日期和互换使节等问题进行磋商。按照“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新中国先后同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丹麦、瑞典、瑞士等国顺利地进行了谈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都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西方大国中英国是最早宣布承认新中国的，1950年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电周恩来外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法律上之政府”，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中国政府与之进行了建交谈判。但是，在与英国谈判过程中，英国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对国民党集团在英国、香港和英属殖民地的态度问题以及中国在上述国家和地区财产的归属问题，不但没有作出满意的答复，并且非法掠夺中国在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财产，追随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以，中英谈判搁浅。此后，到1954年6月日内瓦会议期间，考虑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了有别于美国侵略政策的立场，保守党政府又一再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因此同意同英国互换代办，其任务是谈判建交并处理两国间的侨务和贸易问题。

建国初期，新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及亚洲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西北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较快地建立了外交关系，形成了第一次建交高潮。新中国在处理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的问题上所采取的“先谈判，后建交”的方式，显示了中国

外交的高度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相结合的特色，也反映了我们这个刚刚诞生的国家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尊严的决心，以及它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愿望。

二、“一边倒”，中苏同盟

两位伟人首次握手

新中国成立后明确宣布“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斯大林也须臾没有忘记，苏联不能没有中国这样的朋友。中苏两国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发展彼此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苏联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就宣布承认新中国，并断绝同国民党集团的关系，这给予了新中国以有力的支持。为了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党两国间的友好合作，毛泽东主席亲自出访苏联，协商签订两国间的有关条约和协定，同时参加庆祝斯大林 70 寿辰的活动并参观苏联的建设成就。

1949 年 12 月 16 日，莫斯科银装素裹、白雪皑皑。街头的人们在纷纷讨论着今天的热门话题——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将来到这里。12 时整，随着长长的汽笛声，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驶进了莫斯科车站，顿时鼓乐齐鸣，青年们手持鲜花边挥动边欢呼，车站广场一片喜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之后，毛泽东被安置在郊区一座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居住过的别墅下榻。

当晚10时，毛泽东前往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以斯大林为首，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等苏共高级领导人排成一排迎接毛泽东的到来。斯大林首先微笑着伸出双手迎上前去，毛泽东的双手也伸了过来，两位伟大的共产党领袖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握手。

宾主入座，斯大林望着毛泽东，赞叹说：“伟大，真伟大！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永远健康！”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可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喔，有话无处说，有苦难言……”斯大林当然明白其中原委，急忙接过话题：“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胜利就是一切，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公理。”

斯大林曾经多次对中国革命形势和革命力量作过错误估计，出过一些错主意。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与斯大林有关。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横遭排斥，自井冈山起创建的一片片根据地和几十万工农红军受到严重损失；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大好形势下，又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抗战快要胜利了，斯大林又同罗斯福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答应同美国一起支持蒋介石的统治；内战初起，又不让中共反击……现在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战胜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的800万军队，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正如毛泽东所言，自己是“长期受排挤、受打击的人”，然而胜利者却恰恰是毛泽东。

谣言四起：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

毛泽东同斯大林的初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两位巨人纵论天下大事，会谈的气氛是融洽的。但是，这场谈话只是在接近另立新约的话题时才触及此次访问的关键。

1945年初，德日法西斯在进行垂死挣扎。美军尽管在太平洋战场上一连串的进攻作战都是以胜利告终，但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沉重的。当时的美国政府估计要继续打下去并最终进攻到日本本土，美军的伤亡人数将达到100万，甚至不止这个数字。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损失，美国急于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苏联也想以参加对日作战为条件在亚洲扩展其势力。为此，在1945年2月举行的美、英、苏三国首脑参加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两国达成了一个秘密协定，即《雅尔塔协定》。该协定规定苏联应在德国投降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外蒙古的现状予以维持；恢复原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部分特权，包括中苏合办中东铁路公司，大连商港国际化和苏联租用旅顺为海军基地等；美国总统应促使中国同意上述有关外蒙古和苏联特权的规定。

《雅尔塔协定》是一桩肮脏的幕后交易，它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然而，迫于美、苏的双重压力，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的规定确定了下来。

毫无疑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完全全的不平等条约。依据国际法原则和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它自始就是无效的。毛泽东此次访苏的

首要目的就是商谈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以取代《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消除发展中苏友好的最大障碍，把中苏关系建立在真正的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

然而，另订新约以取代旧约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意味着苏联要放弃大国沙文主义，真正尊重中国的主权。在毛泽东出访前，中共中央就作出决定，届时由经验丰富的周恩来前往苏联担当谈判签约的艰巨任务。在毛泽东与斯大林最初的几次会谈中，另订新约以代旧约的事并未确定，因而周恩来来莫斯科的事也就定不下来，以至拖而不决达17天之久。

双方因此产生了一些隔阂。毛泽东在一连十几天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后，对苏方接待人员发了脾气。

这时，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已引起了国际舆论的种种猜测。许多人认为中苏之间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发生了冲突。再加上这一时期苏联新闻机构很少报道毛泽东的活动和行踪，一时间，谣言四起。有家西方通讯社甚至发表消息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为了澄清事实，同时也为了向国际社会正面说明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中国方面经过紧急磋商，准备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阐明中国代表团的主张。毛泽东在答记者问中指出：“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而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至此，毛泽东访苏的目的已广为周知。